

第一部分



散文

第一篇 桃李情深



想起我的崔老师

早在20世纪40年代，崔玉珠老师就在太原市三桥街的太师附小（现在叫三桥街小学）教书了。在我的印象里，崔老师非常漂亮，就像她的名字一样美。因为她讲普通话，说话的声音又柔和又好听，所以我觉得她应该就是北京人。她留着卷卷的烫发，这在当时也不多见。崔老师脸上总是带着和蔼的笑容，学生们都喜欢她。

我家离学校很近，只隔一堵墙，学校里摇铃，我在家就能听见。我上一年级的时候（1947年），学校设备很简陋，学生上课要自己从家里带小板凳。教室里的黑板也不是像现在这样固定在墙壁上，而是在一个4条腿的“人”字形木架上面放一块刷黑的木板，老师在黑板上写字，稍一用力它就“咯吱、咯吱”地响，甚至还摇摇晃晃。学生们背的小书包都是家长用布做的，里面装着两本书和一块小石板，我们坐在小板凳上，双膝就是桌子，小石板放在膝盖上，用石笔写字。到了冬天教室里很冷，冻僵的手经常握不住细细的石笔，写不成字。崔老师就教我们使劲搓两手，捂到嘴上呵呵热气让手暖和一点再写字。

学校要举行演讲比赛，一年级的学生也参加。崔老师就自己撰写了一篇演讲稿，模仿小孩子的口气讲述冬季锻炼身体的重要性。她一字一句地教我怎么发音，用什么表情，哪句话声音高，哪句话声音低。教了好几天总算把我教会了。



到了比赛那天，崔老师见我的衣服太破旧，就让同班的一个小女孩借外套给我穿。我记得那是一件毛绒绒的漂亮外套，连带着一顶同样毛绒绒的帽子，还有一个长方形的手袋，也是毛绒绒的，双手插在里面比戴手套还暖和。本来我长得又瘦又小，穿上别人的衣服更显得小了，教导主任两手举起我放到用青砖砌成的演讲台上。崔老师笑眯眯地在台下看着我，我大着胆子开始背诵演讲稿。当我背到“缩着脖子袖着手，活像一个大虾米”时，台下的老师同学都大声笑起来。那次演讲我得了第一名，同时也得了个外号——“大虾米”，教导主任一见我就逗：“大虾米，去哪？”高年级学生见了我也喊：“虾米！大虾米！”

光阴似箭，多年后我参加了工作，一个休息日我回到母校去看崔老师。她还住在平房里，说话的声音依然那么柔和、好听，只是显得有些苍老。她已经不认识我了，只记得一个叫董巧鱼的女同学，我们曾经是同班。我和她提起演讲的事，她才想起来：“哎呀！原来是虾米！”

日月如梭，不觉我已经到退休年龄，有了空闲。一天，我忽然想要去看看原来我童年居住过的三桥街。等我走到街口时，发现三桥街早已面目皆非，原先的平房都变成了高楼，只有8号院还保留着原来的模样（这串院子算是政府保护的建筑），我又到学校去看，还是“三桥街小学”，但校园早已完全变了模样，我向里面的人打听崔玉珠老师，他们回答“不知道。”我站在曾经很熟悉、现在却很陌生的校园里，心中涌起一种举目无亲的感伤。走到校门口，看见报栏里贴着学校的历史简介，简介上说三桥街小学是一所具有百年历史的学校。啊！百年老校，我在这里度过了6年美好的童年时光，我的老师崔玉珠也许在这里度过了她一生的所有时光。

（2013年6月13日发表于《太原晚报》）

卢仰祁老师点评：音容笑貌（第一自然段）、当年的条件（第二自然段）、故事（第三自然段）、细节（第四自然段）、看老师（第五自然段）、看母校（第六自然段）。每段末尾都自然而贴切地提到老师，恩重情深。

班主任老师钟泽善

1953年秋，我考入太原市第一中学读初一。由于学校离我家（三桥街）远，所以吃住都在学校，每周回家一次。那年学校一共招收了十几个初中一年级班的新生，我编在初21班。班主任姓马，教我们语文。我个子小，坐在第一排，和我同座位的也是个女生，名叫李萍云。我记得那时来给我们班上课的老师都批评我们班纪律不好，只有图画老师卓然例外，他脾气好从不发火。“身在乱中不知乱”，当时我们的21班已经是全校纪律最混乱的班级了。

上初二了，换了一位班主任，名叫钟泽善。钟老师中等个头，三十多岁，风度翩翩，讲一口四川普通话。西装里面是雪白的衬衣，皮鞋干干净净，表情严肃，站在讲台上，不怒自威，同学们都有点怕他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钟老师是受学校领导委托来整顿我们班的。钟老师果然不辱使命，不久我们班的教学秩序就走上了正轨。至于钟老师采用了什么“整顿”措施，我不得而知。只知道钟老师学识渊博，写一手好字，板书条理，课堂艺术高超，我很佩服他。也许，全班的同学也和我有同样的感受，我们对钟老师又敬又怕。我清楚地记得，初二课本上有一篇课文是“景阳冈”。钟老师讲课时列了一个提纲：一、店家说虎，不信上山；二、告示写虎，继续上山；三、上山遇虎，惊心动魄；四、打死猛虎，力尽下山。钟老师讲课既清楚又生动，我牢牢记住了课文，直到现在依然能完整地讲出景阳冈武松打虎的故事，细节也记得清清楚楚。

时间长了，我们才感到钟老师是个和蔼可亲的人。老师课讲得好，有学问，人正派，是一位谦谦君子，全班同学对老师产生了由衷的爱戴。我和同桌李萍云都喜欢看书，我俩的作文常常受到老师表扬，作文讲评课上也经常念我俩的作文。有一次，老师表扬了一位男同学李书平，他的作文题目是《我们的发号施令兵——老辛同志》。老辛是位在传达室专管收发的校工，还负责上课摇铃（那时没有电铃），李书平写得生动传神，把校工老辛给写活了。在钟老师的培养教育下，全班同学的写作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。

锺老师是一位很负责的班主任，教书又教人。他注重对学生的思想教育，引导学生关心国家大事。1955年国家实行统购统销，锺老师就自己编了个小歌剧，宣传国家的新政策。他挑了四位同学排练表演（班长陈秀英，支部书记刘考未，文体委员王仁义，还有我），我们四个人每天下了晚自习就到锺老师家去排练。锺老师住的教工宿舍只有十几平方米，一家四口挤在一张大床上，地上搁一张桌子，几乎就没有多少活动余地。锺老师指导我们四个学生在家又唱又比划，师娘抱着两个孩子坐在床上看着我们。当时也没多想，现在想起来很对不起他们，两个孩子想必已经很困了。

1956年我初中毕业到六中读高中，就再也没见过锺老师。可是锺老师的音容笑貌却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，他的为人和教学艺术也影响了我的一生，帮助我成长为一名受学生爱戴的教育工作者。

大前年我和班长陈秀英联系上了，费了好大劲才找到7个当年初21班的同学，都已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。我们在一起不约而同地想起了锺泽善老师，老师还好吗？

（写于2015年8月5日）

汉语言文学老师李茂堂

20世纪50年代，我正在读中学。非常幸运，在那6年中我遇到许多好老师，他（她）们都是饱学之士，而且师德高尚，令我终生难忘，李茂堂老师就是其中一位。

李老师给我们讲文学，那年他大约60多岁，脸上皱纹很多，身材瘦小精干，合身的布衣服干干净净，脚上总是一双布鞋，走路不紧不慢，让人想起一句成语——安步当车。20年以后，著名相声演员李文华出现在电视屏幕上，我就觉得特别眼熟，他像极了我们的李茂堂老师，不但外貌、身材相仿，就连说话的声音也很像，我心里暗暗猜想：相声演员李文华该不会是李茂堂老师的亲戚吧！

记得李老师给我们讲两汉乐府《陌上桑》：“日出东南隅，照我秦氏楼。秦氏有好女，自名为罗敷……”讲完后李老师让我们把它改写成散文，同学们非常认真地进行改写，反复读原诗，字斟句酌。我们班有一个女同学名叫吴慧娟，是广东人，她完成得特别好。一周后，李老师来发作文，他腋下夹着一个见棱见方的白布包袱走进教室来，把包袱放在讲桌上，轻轻打开，里面是整整齐齐的一摞作文本，连一个角也没辙。这是我们班同学的作业。我坐在第一排，老师的一举一动，看得真真切切。每次发作文都是这样，那个包袱皮也总是干干净净、雪白雪白的。那天李老师表扬了吴慧娟同学。

还有一次李老师给我们讲古诗《孔雀东南飞》，他也许是被那些优美的诗句深深感动了：“腰若流纨素，耳著明月当。手如削葱根，口如含朱丹……”他在讲台上走来走去，一边吟诵诗句，一边比划着，陶醉在诗歌的意境中。受老师的影响，我对这首诗印象也特别深，几乎能背下来。

李茂堂老师是北大毕业生，听过鲁迅先生和李大钊先生讲课，还参加过著名的五四运动，有一年过五四青年节，学校组织大家在操场上集合，聆听李老师给我们讲当年他参加五四运动的经历。

1959年我高中毕业，离开学校，就没有再见过李茂堂老师。如果他还健在，现在该有100多岁了。

（2015年11月3日发表于《太原晚报》29版“天龙·情感”）

音乐老师寒冷

我上初二的时候太原一中来了一位音乐老师名叫寒冷，是毛里求斯的归国华侨。那时，我们一周上一次音乐课，初一年级时音乐课是由张林戈老师上的，他是学校的少先队大队辅导员，教会我们许多苏联歌曲。这位寒冷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一节课，是讲20世纪50年代他在国外的情况：华侨学生有时会受当地人的欺负，所以他们外出时都要结伴而



行，免不了身上还要带防身用具。同学们听了十分感动。

寒老师说过，离开了祖国就没有温暖，感到寒冷，所以就叫寒冷。我们也不知百家姓里有没有寒姓，反正大家都叫他寒老师。寒老师白白净净，合身的衬衣下摆总是束在裤子的皮带里，显得精干利索，朝气蓬勃。寒老师很有教养，说话和气，对学生很尊重。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叫张柏林，寒老师听他唱歌后很是惊喜，亲切地叫他“柏林”，说他是男低音，还说：“男高音不稀罕，可以拉来一火车；男低音就不同了，很稀少。”那时的我们孤陋寡闻，从来没听过如此的议论，对张柏林同学自然刮目相看，寄予厚望。60年过去了，也不知张柏林同学现在发展得怎么样？

寒老师擅长吹口琴。在一次周末晚会上（我们学校每周都举行周末晚会，由学生会组织），寒冷老师上台表演，他手里拿着一个大盒子，同学们在台下禁不住猜测：里面的口琴一定是个特大号。只见寒老师打开盒子，从里面取出一只很小的口琴，同学们立刻大笑起来。寒老师却一本正经地吹奏起来。别看那么小的一只口琴，发出的音乐却丰富多彩，十分动听，寒老师高超的演奏技巧，赢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。

寒老师教我们的第一支歌曲是《雀儿山》，和当时流行的《二郎山》一样，都是歌颂解放军建设康藏公路的。歌词是这样的：“提起雀儿山，自古少人烟，飞鸟也难过山顶，终年雪不断。”歌词一共有四段，赞扬解放军“个个是英雄”，下决心“雀儿山上扎下营，要把山打通”。曲谱是民歌调，歌词明白晓畅，朗朗上口，大家都喜欢唱。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忆犹新。

1956年我初中毕业，离开一中，再也没见到寒老师。很多年以后，我听说寒冷老师又回到毛里求斯去了。至于是什么原因，说法不一。有人说是困难时期走的，也有人说是反右以后走的。总之，寒冷老师是走了。如果他健在，今年有八十多岁，他的女儿该是60岁了。

（写于2015年7月23日）

生理卫生老师郑明光

1953年，我考上太原市第一中学读初中。教我们“生理卫生”的是一位年轻女教师，叫郑明光。

郑老师瘦瘦的，动作轻轻的，长得眉清目秀，有一头不算浓密的短发。有位同学说：“贵人不顶重发。郑老师头发少，一定是个聪明人。”还说我的头发少，也是聪明人，我听了很高兴。一次学校开运动会，学生老师都参加，郑老师报名女子跳高，我们都去看。那时跳高采用“跨越式”，郑老师轻轻地助跑，到了横杆前轻轻起跳，像一片树叶飘了过去，她得了第一。后来体育老师教我们跳高新方法——“俯卧式”，是从苏联老大哥那儿学来的，再后来跳高姿势又变了，成了“背跃式”，现在奥运会跳高就是这个姿势。我想，郑老师一定没有学会后两种跳高姿势。不过她轻轻飘过横杆的美妙身姿，已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了。

郑老师上课很严肃，讲课没有废话。她讲课的内容我至今记忆犹新。第一是关于用眼卫生，我牢记郑老师的话，看书的时候眼睛和书本相距一尺左右，不在行驶的车上看书，不在强烈的阳光下看书等。所以，我的视力一直很好，后来眼花了才配上了老花镜。第二是关于皮肤的清洁，郑老师讲“清洁的皮肤具有杀菌的作用”，我一直记着老师的话，养成认真洗手的习惯。成家后我爱洗衣服，爱拖地，总觉得清洁的衣服、清洁的地板也具有杀菌的作用。第三更为重要，就是关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可以互为休息的理念。郑老师讲过，看书累了就站起来做两节广播操，或者跑跑步，是对大脑最好的休息。我认真地记住了这个理念，并且努力付诸实践。

参加工作后，我担任数学教学多年，每到期末考试，看到孩子们疲惫不堪的样子非常心疼，就在数学课堂上抽出几分钟让他们做游戏。比如蒙眼睛画人面像，一人画一个部件，6个人完成。画完后一看：鼻子长到了脸上，嘴巴跑到耳朵边，整个一外星人，教室里笑声不断。孩子们高兴了我才开始上课，效果很好，这叫“磨刀不误砍柴工”。后来我参加“成人高考自学考试”，学习汉语言专业，一共10门课程，厚厚的

十几本书，全靠自己一遍又一遍地读，一点一点地啃。我一边上班一边利用业余时间看书学习，有时看书时间久了累得我脑袋都发木，就用冷水洗把脸，洗洗衣服拖拖地，再坐下来继续学习。就这样不到3年时间，我学完了10门课程，取得了大专毕业证。细想起来，是郑老师教给的科学理念，让我终身受益。

初中毕业我离开了一中，再也没有见到过郑明光老师。半个多世纪过去，在我的记忆中，郑老师还是那么年轻、秀气，身轻如燕。

(2016年5月3日发表于《太原晚报》)

我的第一篇散文

我从小就喜欢看书，喜欢写作。上小学时我的作文常常被语文老师批上“传阅”二字，让全班同学传看。我看书的速度非常快，借了别人一本《三国演义》，人家催得紧，我一晚上没睡觉就看完了。老师出了一道作文题“我的理想”，在作文里我表达了长大当一名记者的愿望。可是造化弄人，参加工作后我却当了一名数学教师。

一个人的爱好是难以割舍的。我身为数学教师，当然要认真钻研数学的教材教法，要让学生喜欢上我的课，与此同时也努力坚持着自己的爱好。我常常把教学心得、管理经验写下来，作为“教改笔记”。我还担任了子弟学校的厂报通讯员，经常写一些小消息、小报道，登在厂办报纸《山纺报》上。为此我当了十几年的优秀通讯员，得了许多奖状和奖品。

一年秋天，太原市迎泽公园举办菊花展。那时进公园要买票，我们就买了集体票，由五年级组全体老师领着学生去参观菊展。我当时教五年级三班和四班的数学，临出发时我嘱咐学生带上笔记本做笔记，回来好写作文。没想到四班的一个机灵鬼小男孩忽闪着亮晶晶的大眼睛，调皮地问我：“老师，您写不写作文？”他将我一军。我毫无犹豫立刻回答：“写！”

时值深秋，公园里落叶满地，菊展在室内举行。参观时我做了详细的记录，把菊展的《前言》一字不漏地都抄了下来。展室入口处有一只

菊花摆成的“孔雀”，我把它用简笔画记在本子上，菊展分为好几个室，我都一一做了记录。回到学校，我把五年级的这次参观活动写成一则小消息先投给厂报，然后就开始构思我的“作文”。可是怎么写呢？总不能像小学生一样写篇记叙文吧，要那样我这个当老师的也太没面子了，我得写点高水平的东西。可怎么写才算高水平呢？我犯愁了。白天想，黑夜想，走着站着都在想，想得我头都疼了，最后只好向我爱人求助。我爱人在中学担任教导副主任，兼任高中语文教学工作。他说：“你就写散文吧！”我一头雾水，问他：“什么叫散文？”教了20多年数学，我的文学常识几乎成了空白，什么也不懂。他有点不耐烦，就从书架上取下一本语文书，翻开说：“喏！这篇峻青的《秋色赋》就是散文，自己看吧！”我连忙接过书，把《秋色赋》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，心里明白了，原来这就是散文呀，见过，我可以写。于是动笔写起来。

虽说我看过几篇散文，算是见过面，可真要写起来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毕竟我是第一次写，正应了那句俗话“万事开头难”！不过再难也吓不倒我，不就是散文吗？我决心要试它一试。上班时间根本顾不上写，只有回家写。每天下了班回家，做饭、洗碗、扫地，收拾完所有家务活，晚上9点以后才有空闲。我坐在床上让两腿休息，把枕头垫在背后靠着墙，取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，拿过笔和本在灯光下写我的“作文”。夜深了，家人都睡着了，周围一片宁静。我写了改，改了写，手腕酸了，眼睛涩了，还是不停地写着，写着、写着……就这样写了一个多星期才算写完。在文章开头回忆了我童年时姥姥种菊花的趣事，文章主体当然是参观的过程，中间穿插了苏东坡与王安石的小故事，还有我国菊花的栽培发展史等有关知识（这些都是从菊展的《前言》中抄来的），又联系到“科学的春天”大会，当时国家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的大气候，末尾又联系太原市正在评选“市花”，我就给菊花投了一票。写完后我给文章取名《菊花赋》，认认真真抄写在方格信纸上，请我爱人审查。起初他并不相信我能写成个像样的东西，推说“顾不上”，好几天不搭我的茬。我知道他确实工作很忙，本不想给他添麻烦，可我心中实在是没底，生怕写不成散文的样子让人笑话，好说歹说终于说服了他。没想到看过以后他不但给我改了几处错别字，还加了几句关于王安



石的介绍，深化了主题，这是他对我所写散文的肯定。于是我又重新抄写一遍，托人捎到《山纺报》编辑部，忐忑不安地等着结果。

过了几天，我去上课。一进门，那个机灵鬼小男孩手里挥舞着一张报纸，跳着脚在他的座位旁边大声向我报告：“老师，您的作文登在《山纺报》上了！”说完就向我奔过来，我接过报纸一看，果然，我的文章几乎占了半个版面，题目《菊花赋》三个大字十分醒目，还配有插图和花边图案，很是漂亮。此时教室里像开了锅，热闹极了，许多学生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。有的说：“我家有《山纺报》，我也看见老师的作文了！”有的从书包里掏出报纸，高高举着说：“我也有一张！”于是一群立刻冲过去看。哎呀！这可不得了，现在是上课时间啊！见此情景，我迅速叠起手中的报纸，一步跨上讲台，表情严肃，开始讲课，教室里迅速安静下来。然而那短暂、欢乐的庆祝场面却永远地定格于我的脑海中了。孩子们为我的“处女作”——第一篇散文《菊花赋》，送上了最真诚、最热烈的祝贺，令我终生难忘。

这是1984年的事，那时我已经44岁了。从那以后我开始学着写散文，一直到退休。越写越有兴趣，很多都被发表了，先是发表在《山纺报》上，后来发表在《太原电大》《太原晚报》《并州老龄》《山西老年》和《太原日报》上，还有其他的一些报刊、杂志上。退休18年后，2014年我参加“太原故事美文大奖赛”，在500多篇应征作品中，我写的《三桥街的故事》荣获优秀奖。各位编辑老师和评委老师的认可是对我最大的鼓励。

从第一篇起到2011年2月，我陆陆续续写了七八十篇散文，发表了有50余篇。加上平时胡涂乱抹的一些顺口溜，出于敝帚自珍的情感，在2011年5月自费出版了自己的诗文集，想以此给亲友和学生们留个纪念。在以后的4年时间里我还在继续笔耕，又写了一百多篇文章，发表了80余篇。

忘不了被我的学生叫它“作文”的第一篇散文，我爱上了写“作文”。在30多年时间里，我始终不停地、努力地写着我的“作文”，我要一直写下去。生命不息，写作不止。

（2016年发表于《龙城老年》第2期）

一张贺卡一颗心

我从教师岗位上退休了，十多年来一大摞贺卡始终珍藏在书柜里。那是一颗颗火热的心，温暖着我的退休生活。

翻开20世纪60年代的贺卡，是一张张花花绿绿的自制贺卡。那个年代，每当元旦来临，学校的美术老师就会在图画课上教学生制作贺卡，孩子们也乐意学。于是，各种各样的贺卡就在一双双小手中诞生了，方的、圆的、折叠的、单面的，又写又画十分漂亮。老师们去上课就能收到一大堆贺卡，高高兴兴地抱回办公室。

在这一大摞贺卡中有几张来自清华大学和美国，是由同一个人寄出的，寄卡的人是我的学生小毅。小毅在我们学校上四年级时担任少先队大队长，他的妈妈对他要求很严格，利用暑假给他补完五年级的课程，由四年级跳级升到六年级，成了我的学生。上了六年级，小毅依然出类拔萃，他的母亲经常到我家探讨如何教育孩子。高中毕业后，小毅考上了清华，每到元旦就会寄给我一张贺卡。大学毕业后他到了美国，一边打工一边学习，这期间来过几封信，诉说在国外打工求学的艰难。1998年教师节他从美国寄来了一张贺卡，写着“祝安老师教师节快乐！”还附了一封短信：“十分抱歉久未通信。我已于去年12月份毕业，5月份换了一份工作，搬到了底特律，我想会在这里稳定一段时间。下面是我的地址（略）。”后来，他爱人也去了美国，他们有了两个可爱的儿子，孩子会说英文也会说母语，他们夫妻俩回家都说汉语，他们要让孩子记住：虽然身在美国，但我们的根在中国。去年夏天，小毅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回国探亲，来家里看望我。当年的小学生现在已是年过不惑的一家之长了。我深深感慨光阴似箭，同时也为自己的职业感到自豪。

还有一张贺卡很特别，一打开它就会响起“新年好”的音乐，这是一位名叫杨慧的小女孩送我的。我曾在一所私立学校教数学，她上四年级，家在晋南曲沃，星期天不能回家，我就带她到我家住，她总说：“安老师你就像我奶奶。”1996年元旦她特意买了这张带音乐的贺卡送我。17年过去，贺卡的电池早已没电了，可我还珍藏着，心里想：当年

10岁的杨慧今年该有27岁了，也该结婚有孩子了吧。

有两张来自法国的贺卡是孟昱洁同学寄来的，她6岁上小学我就教她数学，上四年级就参加河西区教育局组织的数学竞赛，获得了二等奖。她的父母都在公安战线工作，很注意对女儿的教育，小昱洁没有一般独生子女的娇骄二气，她学习努力，生活自理能力很强。高中毕业到法国留学两年……

还有几张来自上海财经大学的贺卡，这是李滨同学寄来的，当时他担任班长，高高的个子，文质彬彬，还是学校少先队大队长；还有天津南开大学读书的杨爱萍寄来的贺卡，当时她是班上的数学尖子，从小就立下大志，长大要当个科学家；还有张晋平寄来的贺卡，当时晋平是少先队中队长，文文静静，写一手好字，现在是某街道办事处主任……

翻看着贺卡，面前浮现出一张张稚气、可爱的面容，一段段幸福的往事浮现眼前，一股股暖流漫过心田……

（2013年12月26日发表于《太原晚报》33版，题目改为《暖流阵阵》）

教会我画画的老师们

一位好老师，就是一盏灯，他点亮人生的道路，给学生以温暖和光明。

太原刚解放时我上小学三年级，教图画课的是一位漂亮的女老师，她叫张凤仙。张老师很年轻，刚从师范毕业。她圆圆的脸，长长的辫子，说话和蔼，笑容灿烂，学生们都喜欢她。有一次上课，她让大家画人物像，自己站在讲台上当模特。大家兴致可高啦，纷纷看着她画起来，哈哈！在小学生的笔下张老师被画成各种各样，有一个同学竟然把老师的辫子画成朝天辫，像两只犄角，把大家都笑坏了，张老师也笑得弯下了腰。后来张老师调走了，不教我们了。过了好长时间我偶然在报纸上看见有一幅文章插图，署名“凤仙插画”，才知道张老师调到报社工作去了。

到了五年级，教我们图画的也是一位年轻女教师，名叫王鸣凤。她

瘦瘦的，皮肤白白的，一头乌黑的短发，说话带大同口音。她给我们讲绘画知识，讲线条，讲透视，还给我们讲怎样写美术字，应用透视理论可以让平面美术字有了立体感。

后来我上了初中，又遇到两位好老师，一位是赵梅生，另一位是卓然。这两位老师有学问、有魄力，把太原一中的美术教学搞得有声有色、热火朝天，许多外校喜欢绘画的学生，专门转学到一中来读书。我参加了美术课外活动小组，赵老师辅导我们写生，我学会了用线条表现石膏模型的明暗面。卓然老师给我们上图画课，他备课认真，每节课都有重点，教给了我们许多美术知识。他给我们讲，红、黄、蓝是三原色，每两种配起来就成了第三种色，如红、黄相配成橙色，黄和蓝相配就是绿色等。卓老师为了教会我们写好仿宋体，还特意编了一段顺口溜“起笔顿顿，落笔顿顿，横平竖直，瘦长体形”。那时我最喜欢的课是“名画欣赏”。那些名画都是俄罗斯油画，有《归来》《苏沃洛夫越过阿尔卑斯山》《伊凡雷帝杀子图》《不相称的婚姻》，还有《伏尔加河上的纤夫》等。20世纪50年代，学校里学的外语是俄语，唱的歌是苏联歌曲，课外书是高尔基、普希金的作品，美术课欣赏的也是俄国和苏联画家们的油画名作。卓老师教我们欣赏名画，除了讲解构图、色彩、光线，更注重挖掘画面的内涵，介绍时代背景，讲解历史故事，我们学到的就不仅仅是美术知识了。

时光飞逝，岁月如梭，我从学校毕业了，到一所厂矿子弟学校当了数学老师，经过许多风风雨雨，和老师们都失去了联系。1978年的秋天，没想到卓老师来到我家，全家人喜出望外，热情接待了老师，我们在一起聊了很久。临走卓老师说，过两天他来给我画画。过了两天是国庆节，学校不放假，我正在上课，就委托我的同事，美术教师小孟替我接待、招呼老师。卓老师到了美术办公室，整整画了一个上午，他不但给我画，还给其他老师们画。他的画是大写意老虎，寥寥数笔，一只威武的大老虎就跃然纸上，尤其是那两只眼睛，虎视眈眈、炯炯有神。我把老师赠我的画请人装裱好，逢年过节拿出来挂在墙上，全家人欣赏，来到家里的客人也很欣赏。挂几天就好好收了起来，我要把它留给儿子、孙子……



如今我已是白发苍苍的退休老人，7年前我上了老年大学，学习古典诗词，也学习国画。不为成名成家，只为怡情养性，安度晚年。我常常回忆起教会我画画的各位老师，想起他们亲切的面容，想起他们渊博的学问，想起他们的师德人品，时时照亮着我的人生。

（2013年9月26日发表于《太原晚报》43版“天龙·情感”）

那些单亲家庭的孩子

20世纪90年代，我曾经在一所私立学校教书。当时我担任两个班的数学教学工作，从三年级教到四年级。这所学校成立于1993年，是太原市最早创立的私立学校之一。1994年该学校只有一年级至四年级，每个年级两个班，每班30人。学生有的来自全省各地的农村小学，也有的来自太原市的一些名牌小学，如桃园小学、新道街小学等。学生的家庭都有一定的经济实力，家长付出高昂的学费，为的是让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；也有一部分是因为家长工作忙，无力照看孩子才把孩子送来。这所学校是全封闭式，学生食宿住校，一周才可以回家一次。

时间长了，我发现班里有许多孩子都是单亲家庭，小赛同学就是其中之一。这是个漂亮女孩，白里透红的皮肤，长睫毛的美丽眼睛，微黄的头发有点自然卷，文文静静，学习很好。她的母亲曾经到学校来看孩子，跟我谈起过她的家庭。当时孩子只有10岁，父母离异后把她判给了父亲。母亲非常想念女儿，可是父亲十分固执，坚决反对她们母女见面。有一天女儿住在母亲家，到了晚上，她睡着了，父亲半夜里怒气冲天地找上门来，大声斥骂，小赛只好穿上衣服离开母亲，跟着父亲走了。小赛的母亲也是个漂亮女人，是一位幼儿园教师，说话轻声细语，至于为什么离婚，她没说，我也不便问。但是我能感觉到，夫妻离异给他们一家三口都带来了极大的痛苦。后来小赛的父亲也来过一次学校，这个相貌平平的小个子男人，不爱说话，脸色阴沉，心事重重的样子。听小赛妈妈说，小赛父亲有一个亲戚在美国定居，他计划把女儿送到美

国。我想，小赛真要到了美国，她和母亲就更见不着面了。

与小赛同班还有一个女孩子名叫小怡，也是父母离异，她跟随母亲生活。她母亲来过学校好几次，也许是看见我年纪大些（班主任是个尚未结婚的年轻姑娘），她愿意和我交谈。这是个看起来很强势的女人，高高的个子，浓眉大眼，说话干脆。好像是在一个副食品单位工作，问我需要什么，我谢谢她说不需要什么。和我同一间办公室的小刘老师想请她买点东西，她不予理睬。后来小怡的父亲也来过一次，从外表上看他和前妻相反，是个身材瘦削的文人，记不清是哪家报社的记者了，他很爱自己的女儿。1997年我离开了那所私立学校，小怡给我来过一封信，她在信里说：“安老师，我很想念爸爸。”能感觉到她是流着泪给我写信的。

和她俩同班的一个男同学，姓白，也是父母离异，他跟随母亲生活。这孩子白白的，瘦瘦的，戴一副近视眼镜，他自制力差，管不住自己，有点招人烦。他妈妈眉清目秀，显得很精干很年轻，她到学校来找过我，希望我严格要求她的儿子。我体谅她的苦衷，按她的要求办了。

到期末考试，小白的数学成绩得了100分，他妈妈的非常高兴。1999年夏天，我离开那所私立学校已经两年了，没想到小白的妈妈领着儿子找到我家。他妈妈告诉我，小白也离开了那所私立学校，到了太原市一所公立学校读书。可是那个公立学校的老师不喜欢小白，把他放到教室的最后一排座位上不闻不问，简直把这个孩子给毁了。唉！可怜的小白。

在另一个班级中，也有一个小男孩是单亲家庭。他的名字很有意思，是由父母的姓组成的，他跟随母亲生活，可是他非常崇拜父亲。相处久了，我了解到他的父母都是北京人，有较高的文化素养。这孩子爱看书，记性好，知识面很广，他性格张扬，语言表达能力强。他曾经给我讲过他家的情况，听得出他们家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好。他还告诉我说，他的父亲很有本事，有学问，能吃苦，是个堂堂男子汉。四年级期末考试完毕，他就转学到北京去读书了。临走送我一张照片，那是他和他妈妈的合影，在照片背面写了这样一句话：“安老师，愿您培养出一个班的陈景润。”我曾经给学生们讲过数学家陈景润证明“哥德巴赫猜